

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丛书

◎ 杜常顺 主编

神圣的文化建构 土族民间信仰源流

文忠祥 著

人民出版社

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丛书

◎ 杜常顺 主编

神圣的文化建构 土族民间信仰源流

文忠祥 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李 葳

封面设计:阳洪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圣的文化建构:土族民间信仰源流/文忠祥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丛书)

ISBN 978-7-01-011550-4

I. ①神… II. ①文… III. ①土族-信仰-研究-中国 IV. ①B933②K2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9171 号

神圣的文化建构

SHENSHENG DE WENHUA JIANGOU

——土族民间信仰源流

文忠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347 千字

ISBN 978-7-01-011550-4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丛书总序

杜常顺

青藏高原是举世瞩目的自然地理区域,同时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区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特别是围绕青藏高原主体民族——藏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藏学这样一门显学。很显然,在青藏高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民族生成、发展与流变以及民族迁徙与交融等重要内容。青藏高原从先秦时期就是羌人生息繁衍的重要区域,正是他们创造、奠定了青藏高原历史文化的基础。秦汉至魏晋时期,匈奴、月氏、汉、鲜卑等民族陆续进入青藏高原东北部。此后汉族一直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区域最主要的民族之一。而东胡系统的鲜卑族中,秃发部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南凉王国,慕容部所属的吐谷浑则在青海高原立国三百多年。7世纪,吐蕃王朝崛起并促成藏民族共同体在青藏高原民族中的主体地位。此后数个世纪中,青藏高原逐渐形成以藏族为主体,汉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多民族交错共存的局面。

作为历史文化区域,青藏高原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气息,民族与宗教关系密切。在青藏高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一直盛行于高原各民族社会。7世纪后,佛教在经历了数百年与高原本土宗教文化的斗争磨合之后,终于在10世纪形成了具有鲜明藏民族文化特色的藏传佛教。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与宗教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为文化特征。藏传佛教不仅成为藏民族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的主导力量,而且在藏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支配性作用,其教派、寺院往往兼有社会经济与政治实体的功能,深刻影响了青藏高原的社会及历史进程。伊斯兰教主要是元代以来伴随着回族、撒拉族等穆斯林人口的移入而流布于青藏高原的,其影响渗透于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除此而外,汉传佛

教、道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也都汇聚于青藏高原。

基于青藏高原历史中突出的“民族”与“宗教”元素,相关民族史、宗教史的研究很自然就成为青藏高原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些方面已经是硕果累累,积淀丰厚。

在既往有关青藏高原的历史研究中,传统地方史研究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各种地方通史(如《青海通史》、《西藏通史》)成果,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梳理了青藏高原历史的基本脉络,展示了青藏高原历史的基本内容。但青藏高原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文化区域,还需要有一个更具整体观的研究视角。

近几十年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已在学术界蔚为大观,“华南研究”、“江南研究”、“华北研究”等早已引人瞩目。这些区域研究的主要目的,按区域社会史家陈春生先生的阐述,一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也就是要“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二是要努力了解“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所谓在青藏高原历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实际上就是在把青藏高原视为一个整体区域的基础上,全方位把握其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追寻其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与此同时,透过青藏高原区域社会的历史进程,拓展、深化对中国及其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或者说,从青藏高原这种区域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但很显然,在具有“边疆”与“少数民族区域”这种特性的青藏高原区域社会历史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较之前述的华南、华北、江南等一类区域有着全然不同的模式。在元代之前,青藏高原除东部部分区域之外,并未进入王朝国家政治与行政体系之中,区域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内生的地方性秩序;元代之后,王朝国家也仍然奉行“因俗而治”之策,维持了区域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与秩序。换言之,在青藏高原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中,除局部地区外,王朝国家力量的介入是有限的,甚至没有介入。如清代虽然将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区域纳入直省统治体系,地方社会形成“内地化”趋向,甚至清末川边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高原大部分地区则属地方性秩序主导下的“藩部”社会。地方性秩序的这种主导地位一直到民国时期也未受到明显的触动。

显而易见,对于青藏高原历史的研究,既是深刻理解和认识区域历史与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完整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需要。

青海师范大学地处青藏高原,长期关注和重视青藏高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并以此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近十年来,青海师范大学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并结合相关学科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青藏高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工作,先后成立了青藏高原文化研究所和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研究中心,整合研究力量,制定研究规划,组织具有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背景的中青年学者开展研究工作。这套丛书就是近年来各位中青年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这些成果体现了各位著者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于青藏高原区域历史的积极思考,凝聚着各位在研究中所付出的心力,同时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青海师范大学青藏高原文化研究所暨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进展。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以及对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自觉应用,这些中青年学者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也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区域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的整体水平会得到新的提升。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土族及其社会环境概况	13
第一节 土族概况	13
第二节 土族社会的生态环境	14
第三节 土族社会的人文环境	18
第二章 土族民间信仰的发生空间	24
第一节 土族村落概况	24
第二节 土族村落的空间结构	32
第三节 土族村落的时间制度	42
第三章 土族民间信仰发展史略	57
第一节 先民时期的原始宗教信仰状况	58
第二节 多元文化碰撞与相互混融时期	63
第三节 近现代的变迁	73
第四章 土族民间信仰图景	79
第一节 土族民间信仰的分类	79
第二节 万灵崇拜	82
第三节 人格神崇拜为主题的多神崇拜	101
第四节 民间信仰仪式	127
第五节 禁忌、符咒、占卜、巫术、风水	163
第六节 神职人员及其活动场所	185

第五章 土族民间信仰仪式分析	204
第一节 求雨仪式	205
第二节 跳勃仪式	211
第三节 丧葬仪式	213
第四节 斋醮仪式	228
第五节 纳顿仪式	241
第六章 土族民间信仰象征分析	265
第一节 象征思维	268
第二节 象征结构	273
第三节 象征具象	276
第四节 土族民间信仰中的宇宙观	290
第五节 国家象征符号在民间信仰中的在场	305
结 语	314
参考文献	316
后 记	322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民间信仰是一种古老而又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直到今天,在许多民族、许多地区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土族亦莫能例外。在土族历史上,民间信仰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它是民族文化史发展的固有基石或根源,是祖先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文化财富。当然从现实角度讲,它并非仅仅表现于外在的组织形态或形式主义,而是植根于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活动。今天仍有许多民间信仰群体分布在土族生活的区域,世代传承着他们的信仰观念、信仰习俗,继续着他们异常丰富而沉重的信仰生活。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个社会最真实的反映。研究这些民间信仰的起源、发展和流布,可以最大程度地研读土族社会的面貌。因此,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的民间信仰,在土族文化史上理应有其厚重的分量。研究者们理应从大文化的视角认真对待它,并予以足够的重视,进而以科学的眼光加以认识,切不可忽略。而有意鄙视它、嫌弃它,对于发展现代文化肯定是有损无益的。民族社会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形成和积累有关民族社会的系统知识,增加人类对自身以及生存环境的理解。民族社会研究者不应该去探讨某一现象“是否应该如此”的问题,而是应该探讨某一现象“究竟如何”或者“为什么如此”的问题,应当对民族社会现象进行准确描述,并对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正确解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

在土族研究领域,目前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民间信仰是一项亟待发掘和引起重视的重要课题。过去的文献对于土族宗教信仰的定性不太明确。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原因,只是给土族宗教信仰提供了一个笼统的说法——多神信仰或多神崇拜。但仔细考察后发现,土族宗教信仰中既有原始信仰,诸如萨满教的遗迹,也有藏族苯教信仰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内容,同时道教的影响

也有很大比例,此外也吸纳了许多汉族民间信仰的成分。这反映了文化变迁导致的信仰的变迁。因此,本书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土族民间信仰的发展历程,探讨土族民间信仰的现状与构成,信仰群体的宗教行为对其自身的意义、感受及体验,分析土族民间信仰的仪式过程及其象征意义。

面对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土族社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大潮,各种文化事象以从未有过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发生变迁。20世纪80年代至今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土族民间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民间信仰也相应地发生着某些改变。有些民间信仰事象作为文化事象,已经从土族民众的生活中消逝;更多的面临即将消逝的困境。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而将要消逝的文化事象,无论其对于现实生活的价值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根本没有价值,都有进行保护的必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具有保留传统文化、抢救即将消失的文化现象的意义,更具有理解现实社会并为思考现实生活应该如何发展提供借鉴的意义。本书选定土族民间信仰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也正在此。

土族民间信仰研究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在中国,对于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的“民间信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十分令人瞩目,涉及对其对象、载体、类型及内外部规律的研究。百年来的民间信仰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民间信仰研究至少应包括三个基本领域:民间信仰志、民间信仰论、民间信仰史,它们构成民间信仰研究的三大支点,而它们又各有自己的支系,共同合成一个较完备的研究体系。而迄今的研究大多归属于“民间信仰志”的范畴,涉及“民间信仰论”的较少,涉及“民间信仰史”的则更为鲜见,因此其研究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丰富学理的努力,也是对研究实践的引导。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是客观的存在,而非人为的造作,因此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①民间信仰研究的深入,使其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使其研究体系不断得到建构与完善。因此,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将为中国民间信仰研究添砖加瓦,进行一些有益的理论探索。

赵世瑜认为,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文化变迁的

^① 陶思炎、〔日〕铃木岩弓:《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比较,是复原社会低层文化变迁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①一般来说,政治史是社会大环境变迁的重大因素的记录。而通过对民间信仰的调查与分析,可以“从民俗研究历史”,就是通过观察和研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习俗习惯,来探讨和挖掘其背后深层的历史结构。从民间信仰研究历史社会,可以克服过去历史研究的抽象而走向具体,从宏观走向微观,对民族或区域的小范围的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而综合的探讨。

土族由于用本民族的文字记载历史,而其他民族典籍又很少记载土族状况,故土族口碑资料成为传承历史和民间文化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之一。但社会文化变迁程度的加剧,一方面导致了民族语言运用范围的萎缩,从而进一步导致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口碑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导致了一些传统的社会角色如法师的消失,而他们是口碑文献的重要拥有者之一。这种情况在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代尤为突出,表现为口碑文献的易逝性。这种易逝性表面上表现为是否对其加以妥善保护的问题,实则体现了社会变迁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走向的一种迷失。因此,通过田野调查对民族历史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便被赋予了一种文化抢救意义。作为民族学研究者,对本民族民间信仰展开研究,在中国化的民族学历程中,也称得上一种文化自觉吧。

加强土族研究,也是繁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需要。而民间信仰“在研究内容上也存在着畸重畸轻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一些全国性的信仰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某一地域信仰的深入研究则较为少见;一是目前华南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大大超前于其他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这两种状况都亟待改变。”^②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土族民间信仰又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有机组成内容。笔者选择土族民间信仰作为论题,可以丰富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内容,为改变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不平衡局面作出努力,让土族民间文化之奇葩开放于中国民族花园。

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同样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

①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 王健:《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第一,有助于理解土族乡村社会文化面貌。中国的民间信仰作为最具有乡土特色的宗教现象,带着某种深刻的历史、民族、文化、政治渊源,影响着我国社会特别是乡村下层社会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对于土族来说同样如此。因此,对民间信仰进行考察,对于理解乡村社会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在该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当欠缺,亟待我们做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且随着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等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由抽象走向具体及由宏观走向微观,已为我们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对某些民族或某些区域的小范围的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而综合的探讨,已是势在必行,也是可行的。

第二,有助于促进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发展。“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愉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①一度衰退的村落信仰,近来又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复苏。这使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这样的问题:民间信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如何发展,将走向何处?它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何适应?其在民间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的村落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如何?怎样处理现代化与民间信仰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问题也正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进行回答的问题,这也是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之所在。

作为土族人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民间信仰,在支持人们的信念、安全感和满足感上有什么作用?它又如何建构人们对“生存”、“家庭”、“幸福”的观念?我们不能不追问,这种民间信仰及其影响下的观念与精神,是否有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助于更趋合理的人际关系的形式?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和心理支持系统?这些都需要对民间信仰进行分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要证明它所构成的观念与行为系统有助于认同现代化的社会秩序,也有助于促进经济运作的现代形态的形成;如果要证明民间信仰是一种对抗现代性的力量,它与科学、理性以及现代社会格格不入,那么也需要对民间

^①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信仰及其背后的观念系统、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进行分析。^①

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包含着健康的内容,也含有消极的因素。民间信仰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要影响。健康的民间信仰保存了大量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消极的民间信仰则严重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只有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才能使民间信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② 目前,民间信仰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广大村民生活、生产的指导,而且具备了一定的惯性力量,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信仰的力量不可被忽视或低估。在社会转型时期,深入研究民间信仰可以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让民间信仰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适应,倡导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作出一定的贡献。

第三,有助于加强土族文化研究,提高对土族社会的认识水平。民间信仰作为民族社会中人们生活活动的内容与行为模式,渗透在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体现了民族社会的发育程度和发展状况,还反映了人们的文化观念、精神心理结构以及一些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如果我们能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去探索人们的时代心理及其变化,把历史事件和社会心理趋势融为一体,那么,社会生活史的丰富内涵将奠定民族社会的发展基础。笔者也期望通过本书,在具体的调查资料和类似于个案的实例的支撑下,通过民间信仰来剖析土族社会历史,跳出自始至终的描述和简单的因果分析的窠臼;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客观地反映、阐述土族民间信仰变化的过程,也能够抓住土族民间信仰的基本特质,说明它在土族社会中的基本作用和社会中扮演的基本角色。

二、土族民间信仰研究概况

关于土族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俄国人史禄国指出,土族与满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提出了土族与东胡人的渊源关系;比利时德斯迈、孟塔尔两神甫从语言上直认土人就是蒙古族。自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的学者及边疆工

① 葛兆光:《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寻根》1996年第5期。

② 张鸿石:《论传统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术交流》2003年第3期。

作者围绕土族族源等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①比利时许让神甫(Schram, L. L.)的《甘肃土人的婚姻》是专门论述土族婚姻的著作。^②

1949年以后,民族工作得到重视,许多学者对土族社会历史问题进行多次调查研究,并发表刊行了一些文章,^③为土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以后,土族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相继发表并出版了一些书籍,并于1982年掀起了土族研究的热潮,由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结集印行的《土族族源讨论集》(内部印行)收集了解放前到20世纪80年代讨论土族族源的文献。也就在此时,土族研究走向深入。《土族简史》是比较系统论述土族族源及各项状况的著作。“根据史学界有代表性的看法,归纳为五种: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阻卜说。”“关于土族历史来源的种种问题,尚待今后深入研究。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认为,土族源于吐谷浑之说,道理更多一些,比较可信。”^④吕建福著《土族史》^⑤极力主张吐谷浑说,是目前论述吐谷浑说最具权威和分量的著作,将土族族源问题逐步统一为吐谷浑说。关于土族的研究多数围绕族源展开而涉及历史研究较多,对于其他方面关注很少。

到20世纪90年代,土族文化习俗引起一些民俗、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关注,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文章。关于土族研究的详细情况可以参阅《近百年土族研究概况》^⑥、《近十年来土族研究综述》^⑦及李克郁、李美玲在《河湟蒙古尔人》中的“百年来土族史研究概述”^⑧。

① 如陈寄生:《甘肃青海“土族”之史的考察》;陈寄生:《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卫惠林:《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参见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土族族源讨论集》,内部发行,1982年。

② 参见〔比利时〕许让著,费孝通、王同惠译:《甘肃土人的婚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汪公量:《青海土族简况》;土族简史简志合编;陈玉书:《关于土族的来源问题》,参见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土族族源讨论集》,内部发行,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辑刊(第三辑)》,内部刊物,1955年。

④ 《土族简史》编写组:《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 吕建福:《土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 吕建福:《近百年土族研究概况》,《社会科学参考》1983年第19期。

⑦ 鄂崇荣:《近十年来土族研究综述》,《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⑧ 李克郁、李美玲:《河湟蒙古尔人》,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三辑)》(内部刊物)^①为目前能够看到的较全面地记述土族社会历史以及民间信仰状况的最早的文献,设专章记述土族民间信仰。该书印行于1955年,较为全面地记载了青海土族民间信仰状况,成为后来的研究者参阅的难得的主要文献。《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②中土族民间信仰部分完全采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的内容。也许是时代限制的原因,上述文献中有些记载与实际不符,尤其是音译方面存在较多问题,记述亦比较粗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吕建福《土族中的萨满教遗俗》^③一文开探讨土族中萨满教之先河,以敏锐的学术眼光较早期地关注到土族民间信仰的研究价值。房建昌在《土族地区的白虎祭》^④中叙述了康国泰(即许让神甫)所睹土族地区“安镇”的具体过程。由于当地崇奉以白虎来止雹,故道士们吸取了萨满们的方式。道士们与红教喇嘛在白虎祭中几乎照搬了萨满的全套做法,但却不埋活白狗及公鸡,或许这是萨满白虎祭的最基本的做法,道士们不愿照抄,以示稍有区别。胡廷《土族礼仪文化探析》^⑤从生活礼仪、生产礼仪和人生礼仪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土族礼仪文化蕴含多种宗教文化,融会着多种民族文化。何吉芳《土族禁忌文化浅析》^⑥从土族禁忌的表现形式、传承因素以及禁忌的规范功能三个方面,就土族禁忌文化做了探讨,认为长期以来,土族丰富的禁忌文化在调整人与自然、社会以及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吉芳《民和土族民俗中的尚火文化浅谈》^⑦讨论了土族尚火现象。鄂崇荣《浅析土族民间文化中的多重宗教信仰》^⑧认为土族居住文化、婚丧文化、节日集会文化及神话故事等反映着民间文化的多重宗教因素,

①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三辑)》,内部刊物,1955年。

②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青海省编辑组:《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吕建福:《土族中的萨满教遗俗》,《社会科学参考》1985年第14期。

④ 房建昌:《土族地区的白虎祭》,《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⑤ 胡廷:《土族礼仪文化探析》,《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⑥ 何吉芳:《土族禁忌文化浅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⑦ 何吉芳:《民和土族民俗中的尚火文化浅谈》,《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⑧ 鄂崇荣:《浅析土族民间文化中的多重宗教信仰》,《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说明了土族文化生活中萨满教、道教、佛教及藏传佛教等多重因素并存的事实。杨卫《土族命名中的文化蕴含——对互助县两个土族村庄的调查》^①探讨了土族民间信仰在命名上的反映。蒲文成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②详细介绍了土族地区的寺院状况。翟存明《简述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发展历史》^③提出至少在元末明初,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均已传入土族地区,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明代以后,随着格鲁派的产生及其在土族地区的传播,藏传佛教在该地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藏传佛教通过与各种文化,尤其是与苯教的斗争和融合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二是中国再次走向大统一,结束了西藏地区持续四百多年的战乱割据局面。在元帝室的支持下,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明代的“多封众建”政策亦扶植藏传佛教高僧,使藏传佛教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清代采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政策,使得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达到了鼎盛时期。唐景福《藏传佛教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④也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发展脉络。范玉梅《土族宗教信仰述略》^⑤根据文献资料论述了土族社会中萨满教、苯教、佛教、道教、民间地方信仰等内容。李巍《土族神话中蕴含的萨满文化成分》^⑥通过对土族神话内容的透视、梳理,挖掘出蕴含其中的萨满文化遗痕,进而追溯土族人民原始萨满信仰观念的最初踪迹。马海寿《从辛家“法会”看土族萨满遗风》^⑦讨论了民和土族的萨满法会,而李存福《“口帮口帮会”及其来源探索》^⑧记述分析了互助土族的法会。星全成《土族供奉神箭的传说》^⑨、杨卫、杨德《土族“神箭”崇拜初探》^⑩等探讨

① 杨卫:《土族命名中的文化蕴含——对互助县两个土族村庄的调查》,《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翟存明:《简述藏传佛教在土族地区的发展历史》,《西藏研究》2001年第2期。

④ 唐景福:《藏传佛教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⑤ 范玉梅:《土族宗教信仰述略》,《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

⑥ 李巍:《土族神话中蕴含的萨满文化成分》,《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⑦ 马海寿:《从辛家“法会”看土族萨满遗风》,《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⑧ 李存福:《“口帮口帮会”及其来源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⑨ 星全成:《土族供奉神箭的传说》,《中国土族》2004年秋季号。

⑩ 杨卫、杨德:《土族“神箭”崇拜初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互助土族供奉神箭的信仰事象。

关于土族丧葬文化,李克郁等《土族婚丧文化》^①、何峰《民和土族丧葬习俗之调查与研究》^②、园林《青海土族丧葬文化》^③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讨论。

席元麟著《事象征兆与土族文化心理》^④,从生理事象与生活的关系、飞禽事象与人和自然的关系、动物事象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植物事象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天气事象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论述了土族征兆现象。席元麟《土族的尚白文化现象》^⑤描述了土族尚白文化现象。白晓霞《从“丰产”信仰看土族文化》^⑥述及土族生产信仰的民俗事象。徐长菊《话说土族的太阳崇拜》^⑦从土族地区的一些神话传说、民间习俗入手,对土族地区太阳崇拜和火崇拜进行分析与评述,提出太阳崇拜与火崇拜的融合是土族地区原始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这些文献为土族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研究打下了基础,是进一步加深研究的基石。

另外,关于土族民间文化研究的文献对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具有很大的帮助。马光星《民和官亭地区土族的“七月会”》^⑧首次向外界介绍土族纳顿节,涉及纳顿中的信仰因素;马光星《土族傩文化的形态特征及源流关系》^⑨将土族纳顿等归结为傩祭,认为纳顿的会手舞、面具舞等是傩戏、傩舞。秦永章《青海民和土族地区“纳顿”述略》^⑩、刘凯《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纳顿”新识》^⑪、鄂崇荣《浅释民和土族村庙中的“装脏”仪式》^⑫等从各自的视野、从不同角度分析纳顿,加深了纳顿研究,丰富了土族文化研究。马光星等著《人神

① 李克郁、李美玲、李永翎:《土族婚丧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何峰:《民和土族丧葬习俗之调查与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③ 园林:《青海土族丧葬文化》,《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席元麟:《事象征兆与土族文化心理》,《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⑤ 席元麟:《土族的尚白文化现象》,《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⑥ 白晓霞:《从“丰产”信仰看土族文化》,《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⑦ 徐长菊:《话说土族的太阳崇拜》,《中国土族》2004年春季号。

⑧ 马光星:《民和官亭地区土族的“七月会”》,《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⑨ 马光星:《土族傩文化的形态特征及源流关系》,《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3期。

⑩ 秦永章:《青海民和土族地区“纳顿”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⑪ 刘凯:《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纳顿”新识》,《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⑫ 鄂崇荣:《浅释民和土族村庙中的“装脏”仪式》,《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